

试析史学研究中方志的应用：基于 2023 年历史学 25 种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的分析

关书朋

提 要：史学研究的特点与方志的内在属性，共同决定着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检索 2023 年历史学 25 种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中国史研究论文，其中引用方志文献的有 294 篇。以这些文章为研究对象，探讨方志在经济史、政治军事史与社会文化史等不同史学研究类别中应用的范围与局限，分析史学研究论文征引方志的种类与门类类型，以期拓展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史学研究 方志 期刊 应用

随着各类方志数据库的丰富与完善，方志在学术研究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拓展，部分学者已对此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如潘高升《史学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一文，梳理方志在史学研究中作为资料引用的几类代表性学术成果，探讨史学研究利用方志资料的具体路径。方志资料作为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存在作为资料直接引用、经过制度分析后引用、透过背后社会权力话语的引用，以及透过意识、价值等文化规范后的引用等 4 种应用方式。该文阐述方志资料应用与近年来学术思潮和史学研究转向之间的关系，指出方志的资料性和著述性对立统一的特性：方志编纂跨越时空的时代感，以及方志的性质、编纂的目的与方志的利用者的认识存在的差异，导致学术研究中方志应用呈现出不同侧重。^①张丽以《中国地方志》《江苏地方志》2020—2021 年刊载的对方志有参考引用的文章为研究对象，考察方志学研究、区域史研究，分析当前学术研究中利用方志的特点以及方志在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价值，认为方志资料被普遍地直接引用，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回顾以往方志应用的研究成果，多数论述立足方志的“资料性”，部分涉及方志的“文献性”，但这些研究都缺乏必要的量化总结与分析。为系统考察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笔者对 2023 年历史学 25 种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中国史研究专题论文进行梳理，并对其中含有方志引用的文章进行量化分析，进一步考察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的范围与局限，以期对方志应用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借鉴。

一 史学研究应用方志的总体情况

2023 年历史学 25 种 CSSCI 来源期刊共发表中国史研究论文 1685 篇，其中应用方志进行研究的论文有 294 篇，约占中国史研究论文的 17.45%（见表 1）。

① 参见潘高升：《史学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中国地方志》2006 年第 4 期。

② 参见张丽：《当前学术研究中地方志利用状况的探究与思考——以〈中国地方志〉〈江苏地方志〉刊文为例》，《上海地方志》2023 年第 1 期。

表1 2023 年历史学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中国史研究论文
及引用方志论文统计表

序号	期刊名称	中国史研究 论文数量	引用方志 论文数量	引用方志 论文占比
1	《经济社会史评论》	8	4	50.00%
2	《中国农史》	74	29	39.19%
3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43	15	34.88%
4	《中国经济史研究》	106	36	33.96%
5	《历史档案》	74	23	31.08%
6	《清史研究》	87	25	28.74%
7	《安徽史学》	97	27	27.84%
8	《史学集刊》	50	13	26.00%
9	《史林》	94	23	24.47%
10	《古代文明》	31	6	19.35%
11	《文史》	49	9	18.37%
12	《当代中国史研究》	76	12	15.79%
13	《西域研究》	70	11	15.71%
14	《文献》	75	10	13.33%
15	《历史研究》	69	9	13.04%
16	《自然科学史研究》	27	3	11.11%
17	《史学月刊》	114	12	10.53%
18	《近代史研究》	80	7	8.75%
19	《史学理论研究》	53	4	7.55%
20	《中国史研究》	61	4	6.56%
21	《史学史研究》	39	2	5.13%
22	《东南文化》	134	5	3.73%
23	《中华文史论丛》	59	2	3.39%
24	《抗日战争研究》	62	2	3.23%
25	《民国档案》	53	1	1.89%
合计		1685	294	17.45%

说明：2023 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出的历史学 CSSCI 来源期刊共 28 种，其中《世界历史》不发表中国史研究论文；《中国史研究动态》主要发表综述类论文，未涉及方志应用；《华人华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文侧重华人在海外的活动和归国华侨活动研究，仅有 3 篇论文略涉及新方志的引用，引用量极少。故本文未将上述 3 种期刊纳入考察统计范围

因期刊主题定位各有侧重,因此不同期刊发表引用方志的论文数量也存在明显差异。以引用方志文献论文数量占比为考察视角,《经济社会史评论》《中国农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4种期刊发表的引用方志文献的论文数量占比最高,反映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以方志文献作为重要参考并高度引用。《历史档案》与《清史研究》作为以发表明清史研究文章为主的期刊,引用方志文献占比分别为31.08%和28.74%,反映出明清史研究领域对方志史料应用的重视。《安徽史学》《史学集刊》与《史林》发表的论文以安徽、东北、上海三地的区域史研究为主,引用方志论文的数量占比均超过20%,反映出方志文献在区域史研究中受到学者关注的情况。此类期刊还有《西域研究》,其发表的部分论文基于新疆地区的方志,探讨西北边疆治理、新疆地方史、西域考古等问题。中国史研究论文中利用地方志既包括旧方志的参考,也包括新方志的应用。如《当代中国史研究》引用方志文献的论文数量占比15.79%,主要是对新方志的引用,反映出新方志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与潜力。

从总体来看,各期刊发表的应用方志文献的文章,在研究时段上多聚焦明清时期,在研究主题上侧重经济史与区域社会史。究其原因,这一现象当与方志文献地域性的著述特点及现存方志的分布和整理情况密不可分。

二 史学研究应用方志的考察

在征引方志的中国史研究论文中,从引用的位置看,方志在引言、结语出现频率较低,多被用在正文中作为论据发挥证史作用。考察含方志引用的294篇论文,其中71篇仅征引1部方志,116篇征引方志5部及以上,还有2篇征引方志40余部。^①论文征引方志的数量,反映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所有史学研究论文中,方志应用最多的是经济史、政治军事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

(一) 经济史研究

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通常是研究的重点,包括历代土地制度、赋税徭役、户籍制度、货币制度、商业政策等领域的考察。在具体研究中,方志资料提供了各地政策或制度具体执行的状况。如陈博翼《明代南直隶养马徭役研究:制度运作与地方因应》一文,利用弘治《句容县志》、嘉靖《高淳县志》、嘉靖《六合县志》、嘉靖《宿州志》、嘉靖《泾县志》、隆庆《赵州志》、隆庆《海州志》、隆庆《仪真县志》、万历《扬州府志》、崇祯《吴县志》、雍正《扬州府志》、康熙《徽州府志》、乾隆《高邮州志》、乾隆《江南通志》、嘉庆《如皋县志》、《南京太仆寺志》等42种方志,探讨明代南直隶养马徭役问题,以马政制度和赋役体系变化过程为考察视角,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揭示明代国家财政赋役制度运作的变革。^②该文显示出正史与方志应用于赋役制度研究的差异,正史勾勒出国家徭役政策的基本框架,方志则详细地呈现出各州县政策推行实践的细节,凸显了中央与地方在经济政策制定与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张力。

方志中记载的赋役数据,是深入考察区域民众阶层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基础。马志超《明代湖广的永冲站户及其民籍化》参考25种方志,对明代湖广地区站户承担赋役进行考察,包括明代站籍的来源,以及站役与赋役改革相关问题。该文通过梳理方志中记载的赋役量,指出明代的

① 葛小寒《明代浙江“虎患”考》引用方志49部(《经济社会史评论》2023年第2期);陈博翼《明代南直隶养马徭役研究:制度运作与地方因应》引用方志42部(《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3期)。

② 参见陈博翼:《明代南直隶养马徭役研究:制度运作与地方因应》,《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3期。

赋役改革客观上废除了一些世袭性的差役及站籍，导致部分站籍的民籍化。^①周星宇、曹树基《化民为贼：明代南赣地区的赋役、移民与民变——以龙南、安远两县为中心》一文，运用近20种方志，探讨明代南赣地区的赋役与移民、民变的关系。^②该文通过对方志“赋役”门目数据的分析，直观呈现地方赋役量的变化，从侧面反映社会问题。通过梳理龙南、安远两县方志中的人口数、耕地亩数与征收田赋数的变化，指出南赣地方官在赋役体系严重失衡的情形下，为保仕途，人为地将境内以前招抚的“新民”建构成不交田赋、不派役的“化外之民”，从而刺激民变，实现以掠夺和收编的方式重建纳税田赋与派役人口的目的。官员对于民变的态度又影响着方志的编纂，最终建构起关于“民变”的新的社会记忆。在考绩压力影响下，明代官员在方志中记载税亩数与民变现象时存在故意失实的描述。随着赋役征收愈来愈成为官员考绩的核心，明代方志记载的田亩数已经成为“催科指标”而非官府实际控制税亩数，有关“民变”的记载亦是出于平衡赋役体系的需要而被有意改写。方志的书写影响着方志的诠释与应用，应用方志还原历史现象，不能忽略方志编纂的时代背景与书写意图。

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方志较多的还有人口、漕运史研究。如苏金花基于方志与朱批奏折史料，考察清代黔东南地区“苗疆”六厅的人口，其中乾隆后期至同光时期人口的查证，几乎全部依据贵州地区各类府厅县志中“户口”“苗寨”等门目的数据。^③由于清代苗疆地界不入国家编审，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厅人口在奏折、《实录》等资料中存在严重的漏记现象，六厅地区方志的记载反而更接近实际，相对准确地呈现出六厅人口数据。

漕运史研究中应用方志史料，显示出专志与通志配合下的制度史研究特点。杨泉、罗冬阳利用15种方志资料考察《扬州营志》和天启《淮安府志》等志，考察清江船厂漕船料银的收支与贮存，以及漕运衙门职掌的变化、漕库的漕粮管理。^④阮宝玉结合十几种省府州县志以及《南京户部志》《南京都察院志》《漕河图志》等志，考察南粮北漕分征分解给沿途各县带来的财政负担，以及实际运作过程中的差异。^⑤尽管3篇文章的研究对象与考察视角多元，但在漕粮征收、漕运过程与漕粮贮藏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中，都体现出专志应用的空间和价值。

对古代经济活动进行考察，如农业史、工商业史研究，长期以来不仅是学者关注的重要目标，也是方志应用较多的领域。在农本思想占居主导地位的时代，农业史研究应用方志聚焦在农作物种植与土地利用的考察。如杜新豪《明代中后期山东的稻作技术与稻米南销》一文，引用34部山东地区方志，基于“物产”“田赋”“风土”等记载，横向考证了山东稻米的种植类型、耕作技术、产量与外销情况，并与《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一书相比较，指出随着明代中后期土地不断开发利用，这一时期的方志编纂更注重保存水稻种植的成功经验。^⑥该文对于方志稻作数据的挖掘，不仅厘清山东各地水稻种植的差异，亦体现方志编纂者对民生的重视。朱义明《清代山东州县折亩研究方法》一文，在考察清代山东地区折亩现象时，列举55种县志中不同类型的田亩产量与赋税数据，指出方志在折亩研究中存在门目统计数据的差异和矛

① 参见马志超：《明代湖广的永充站户及其民籍化》，《史学月刊》2023年第11期。

② 参见周星宇、曹树基：《化民为贼：明代南赣地区的赋役、移民与民变——以龙南、安远两县为中心》，《史林》2023年第1期。

③ 参见苏金花、蓝迪：《清代黔东南“苗疆”六厅人口探析》，《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2023年第4期。

④ 参见张叶：《漕库之滥觞：明嘉隆间漕船料银与漕运衙门的财政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4期。

⑤ 参见阮宝玉：《明清时期南粮与北漕供应体制的关系及其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年第4期。

⑥ 参见杜新豪：《明代中后期山东的稻作技术与稻米南销》，《中国农史》2023年第5期。

盾。^① 两相比较，杜文强调方志数据的重要性，朱文辨析方志数据的有效性问题的。方志记载的土地开垦与赋额数据，虽因修志间隔时间过久、地方文献佚失、实地调查漏记等客观局限，或修志者水平参差不齐、虚应故事的态度等主观影响而存在一些谬误，但这些数据毕竟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农业发展面貌，是量化分析区域农业变迁的基础，促进了农业史微观研究的深入。

部分学者充分利用碑刻和方志资料，对商人群体以及商人经营活动进行考察。如许檀利用乾隆《武威县志》、乾隆《甘州府志》、乾隆《孟县志》、嘉庆《孟津县志》、道光《敦煌县志》、道光《靖远县志》、光绪《山西通志》，以及嘉靖、乾隆、道光、光绪《亳州志》，乾隆《大荔县志》，道光《阜阳县志》，光绪《凤阳府志》和新编《亳州市志》等多地方志记载，详细考察山陕商人、江宁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商货贸易转输的路线、重要节点等。方志记载的内容不仅可以弥补碑刻字迹漫漶难读之不足，补充商人经营的具体商业活动，如通过方志所载商号的纳税额度等数据，从侧面展现商号的经营规模。^② 在这一方面，方志起到正史之谬、补史之阙的作用。

方志作为地域性文献，能系统地反映各地商人群体的经营活动。笔者梳理 2023 年 CSSCI 来源期刊，涉及市场贸易和商人活动的文章共有 7 篇（见表 2）。

表 2 2023 年 CSSCI 来源期刊中商业史应用方志研究论文统计表

序号	作者	论文名称	期刊
1	程立中	明清时期全国性药材市场的形成路径研究——以祁州药市为中心	《安徽史学》2023 年第 4 期
2	冯慧鑫	明清湖北的棉花种植与棉花贸易——以江汉平原为中心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3 年第 4 期
3	方圆	明清漳州府城市场网络的演变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4	王大任	近代东北地区镇级市场中定期市与常市的分布及其影响	《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5	黄凯凯	清前中期扬州盐商的引窝交易与资本市场	《史林》2023 年第 5 期
6	黄雅雯	清前期山东沿海州县票盐制度的重塑——以寿光县、昌邑县为例	《中国经济史研究》2023 年第 6 期
7	刘云林丽珍	黑白蕃：宋代泉州蕃商与海洋贸易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3 年第 4 期

从表 2 可见，表内前 4 篇论文考察商品贸易与市镇市场网络的形成和分布，后 3 篇讨论期权交易、票盐制度以及蕃商与海洋贸易，既涉及经济制度改革对商业贸易的影响，也涉及商品交易

① 参见朱义明：《清代山东州县折亩研究方法》，《清史研究》2023 年第 4 期。

② 参见许檀：《乾隆年间活跃在武威的山陕商人——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3 年第 1 期。《清代中叶山陕、江宁商人在亳州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23 年第 3 期。

的网络，还对市镇区域性市场的发展进行了探讨。尤其第7篇对外国商人的来源及交易货物的考察，作者广泛利用《两淮盐法志》《山东盐法志》《诸蕃志》以及泉州地区方志中的“古迹”等内容，显示出不同类型方志在商业经济活动考察中的多元学术价值。

尽管经济史研究仍以旧方志应用为主，但对当代经济活动的研究，新方志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邓理《通信技术与国家治理：1956—1960年农村电话网建设考察》一文，通过《邮电志》《电信志》的记载，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话网在农村地区铺设的背景、过程与影响。^①于广《上海地铁建设的历史考察（1953—1993年）》一文，利用上海地区的方志并结合档案等资料，系统地考证上海地铁建设的动因与施工过程。^②上述两文均从方志出发，结合档案、报刊等多重资料，一起建构当代中国特定经济活动的系统叙事。新方志是“当代人汇集当代资料”，“门类繁多，内容翔实，价值很高”，为置身于共时环境的当代历史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比较系统的宝贵资料”，成为学者们检索与利用的基础。^③

（二）政治军事史研究

方志应用于政治军事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方行政制度的运作、礼制、兵制、兵防武备、边防、海防等方面，其中考察地方兵备管理的论文应用旧志较多。如任建敏的《兵民之间：清代广西堡兵制度的因革与调适》^④和唐晓涛的《徭兵并未消失：清代徭兵徭田的制度与实践》^⑤，利用两广地区方志，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清代堡兵、徭兵制度进行考察。前者利用广西通志与府州县方志记载的具体官民交涉案例，探讨堡兵制度在清代的调整与改造实践；后者则大量摘引方志中记载的兵堡兵数、土地亩数与赋役额数等数据，梳理清代徭兵人口、徭田数量及徭田赋役征收情况，勾勒出清代徭兵徭田变动的清晰图景。在涉及徭田赋役考察时，明代方志不见徭田的记载，而清代方志却记载着大量明代徭田徭米徭谷数据，这一现象也透漏出明清官方在徭兵界分与土地登记制度上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通过系统考察相同或相似的方志门目在不同时空场域的书写特征，可间接追踪文本背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演变。

区域性武装团体的考察，是应用方志较多的另一类研究领域。曹文瀚基于山东各地方志中的“人物”门目数据，列出红袄军第二至第四代首领李全、杨妙真、李璫时期集团重要人物，并考察其籍贯、加入红袄军的背景、起事经历与社会关系，建构起红袄军成员的集团结构，探讨李璫起事叛元背后的动因与部众回应。^⑥正史对红袄军等地方军事团体相关人物记载不足且具有偏见性，方志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相关资料。

方志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社会对中央王朝的向心力，对于边疆治理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赵卫宾《清代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与王朝国家认同塑造研究》一文，依据档案和正史记载，利用《钦定八旗通志》《回疆通志》《哈密志》《新疆乡土志稿》和《新疆輿图风土考》等，考察并指出新疆各地万寿宫的营建及其举行朝贺礼的仪式规程，塑造并反映了疆区官民对清

① 参见邓理：《通信技术与国家治理：1956—1960年农村电话网建设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参见于广：《上海地铁建设的历史考察（1953—1993年）》，《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

③ 参见熊月之：《为上海研究提供史志资料》，《解放日报》2024年1月14日第6版。

④ 任建敏：《兵民之间：清代广西堡兵制度的因革与调适》，《清史研究》2023年第6期。

⑤ 参见唐晓涛：《徭兵并未消失：清代徭兵徭田的制度与实践》，《清史研究》2023年第6期。

⑥ 参见曹文瀚：《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研究：以红袄军杨妙真、李璫集团为例》，《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1期。

代中央王朝政治的认同。^①方志记载的万寿宫营建布局、式样、形制、规模、分布、数量等,也弥补了官方档案和正史记载不足。万寿宫作为清朝皇帝和清朝政府在新疆具象化和景观化的体现,成为新疆官民感受与体验清朝国家存在的最高礼制建筑。关于新疆治理,张小李《清朝国家祭祀体系之下的新疆官方祭祀体系设置与新疆治理》一文,梳理《钦定大清会典》和《新疆图志》以及新疆地区府县乡土志的记载,对新疆官方坛庙设置与祀典举行情形进行考察,认为新疆官方祭祀是清朝地方国家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清朝其他各省国家祭祀一样,与主要位于京师的皇帝参与的中枢国家祭祀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新疆官方祭祀极大地强化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央朝廷的向心力。^②可见,方志文献所勾勒出的祭祀信仰体系的设置、构成与演变,与官方史料文献一起起到了互证补充的作用。

在边疆认同研究中,另有一类专注方志编纂研究。秦浩翔、谢宏维通过梳理台湾地区方志编纂实践展开边疆认同的考察,考证清代不同时期台湾府县方志的编纂背景、修志士绅身份认定、门目设置与具体内容的记载倾向,根据方志本身的演变来揭示台湾地区融入国家认同的历程,强调方志背后政治语境的意涵。^③

海域勘界是国家海防和海域经营治理的重要方面,清朝东部海域属江南、浙江管辖,为解决两省海界纠纷,实现规范管理,江浙地方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和光绪九年(1883)先后开展7次海域勘界。宋可达《清代江浙海域勘界考述》一文,引用江浙方志中武备、兵防、海防、地理等数据,结合《实录》与清人文集,阐述江浙海界纠纷的由来与治理过程,凸显清朝政府海疆治理理念的日益清晰。^④在疆域勘界研究中,方志“建置沿革”“疆域”等门目,是方志区别于其他文献史料的根本,亦是区域地理研究的核心史料。然而,考诸古今地理沿革,名同而地异的记载不可胜数,张冠李戴的描述亦不少见,方志地理门类记载的准确性良莠参半。就此意义而言,考证方志所载的地理沿革是方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总体而言,在政治军事史研究中,方志应用往往结合《实录》《会典》等官方文献,以厘清研究对象所处的客观时空背景。官方政书档案等相关史料提供了有关制度的规定,而方志所展现的是不同行政制度在各地实际运作中存在的变异与妥协,以及制度执行在地方的差异与局限,也凸显了国史与地方志各自不同的价值和特点。

(三) 社会文化史研究

方志应用于社会文化史研究,侧重于对地方社会结构变迁、基层社会治理、区域风俗信仰演变与方志文化书写等几类内容的考察,其中有关社会结构变迁的考察又往往交织着地方治理,因关涉官民互动而应用方志最多。葛小寒《明代浙江“虎患”考》,引用近50部方志,大量摘引“灾祥”“祥异”“兽类”“妖祥”“土产”“寺观”“物产”等多个门目的数据,考证明代浙江地区的虎患现象与治虎对策。^⑤文章指出明代浙江地区老虎伤人事件散见于方志不同门目中,辩证地阐明位于“灾祥”门目中的老虎袭人事件才称得上是“虎患”;散见于人物传中的老虎袭人事件,意在行使方志教化扬善职能,并不能简单地视为“虎患”。该文分析方

① 参见赵卫宾:《清代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与王朝国家认同塑造研究》,《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

② 参见张小李:《清朝国家祭祀体系之下的新疆官方祭祀体系设置与新疆治理》,《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

③ 参见秦浩翔、谢宏维:《从“纳入版图”到“边疆危机”——清代台湾方志书写与王朝国家认同》,《清史研究》2023年第1期。

④ 参见宋可达:《清代江浙海域勘界考述》,《清史研究》2023年第2期。

⑤ 参见葛小寒:《明代浙江“虎患”考》,《经济社会史评论》2023年第2期。

志所载虎患高发的空间区域与浙省官民应对，探讨虎患治理背后地方行政权力间的制约，并结合“虎患”记载多见于方志“灾祥”类门目，且常与地方社会失序、战争溃败等恶兆联系的现象，指出明代方志中关于虎患与治虎的记载，在日常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发挥了教化、资政双重作用。

地方社会不同族群、各社会组织结构之间互动的考察，是方志应用于区域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视角。赵晓梅基于广西地区方志，从地方动乱、聚落环境、科举教化等多个横切面，揭示清代及民国时期广西红瑶的生存状态。^①该文应用方志揭示地域治理时，亦侧重对方志所载广西社会族群变迁的分析。现实的武装暴动、基层教化等往往自下而上蔓延开来，缓慢但又持续地渗透社会生活，而方志记载却是在自上而下的政治语境下展开书写。因此，作为官修史书的方志在介入民间族群问题时，往往会受到“正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而模糊掉民间的声音，导致民间的“声音”在方志中销声匿迹或分散于不同门目。

方志的价值体系因受编纂者微妙心态与渗透在意识形态中的政治话语权力的支配，影响着方志进入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深度。王家耀针对康熙《连阳八排风土记》（以下简称“《风土记》”）编纂过程的考证，显示出方志文献背后复杂的权力话语之争。^②李来章任连山知县时，为显示教化瑶人的政绩并处理与朝廷新设理瑶同知的权责矛盾，通过编纂《风土记》确立自己的地方权威。为了显示李来章推行的瑶人教化政策的正当性，《风土记》有意忽视瑶人与民人在生存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将八排瑶塑造为“长期叛乱者”。作为一部官方编纂的志书，《风土记》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后人对八排瑶“顽梗”形象的认知。前人有意的书写，随着后对方志的重修、阅读而愈发“真实”，最终形成难以觉察的社会记忆。《桑园围志》的编纂理念，与《连阳八排风土记》几乎无差，旨在凸显地域社会水利秩序中的“权力文化网络”^③。在方志编纂过程中，由地方官府、强宗豪族与普通民众等多类社会组织交织而成的权力话语竞争秩序，塑造着地方社会的记忆；而志书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历史记忆又反过来维系着地方社会秩序的张力，构成解读地方社会的切片。就此意义而言，因编纂本身而导致方志文献的“失实”，看似限制了方志的应用，但透过对“污染”过程的考证，又能显示出方志阐释学的独特魅力。^④

与此同时，通过对方志所载的地方风俗信仰、礼仪程式等思想载体演变过程的考察，可从不同维度透视区域社会的基本风貌。张磊利用甘肃方志记载关帝庙建造时间、地域分布，揭示关帝信仰从明朝官方指定的“外来神”逐渐本土化的动态演进路径。^⑤皮庆生考察朱元璋题祠山御诗在广德民间的流播时亦采取类似理路。^⑥李媛大量摘录方志中记载的京师、陕西、河南、湖

① 参见赵晓梅：《族群与域界——清代民国时期广西红瑶的社会变迁》，《史林》2023年第6期。

② 参见王家耀：《寓“管治”于“教化”？——〈连阳八排风土记〉的编纂与清代广东八排瑶社会》，《清史研究》2023年第6期。

③ 参见宁晓莞、张佩国：《清代桑园围的景观制作与历史记忆——围绕〈桑园围志〉的编纂》，《中国农史》2023年第6期。

④ 潘高升认为覆盖在“方志资料”上的“历史叙述”，已经受到了诸如编纂者主观意识、官方经济政治制度话语、编纂群体背后的权力网络等因素的“污染”，而天然地在史学研究中存在局限。参见潘高升：《史学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4期。

⑤ 参见张磊：《元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在河西地区的流播与演变》，《历史档案》2023年第2期。

⑥ 参见皮庆生：《皇帝在庙——朱元璋题祠山御诗的传说与演化》，《史林》2023年第4期。

广、广东等地的宾兴礼仪程式，勾勒出明代地方宾兴礼仪的基本情形。^① 方志进入社会文化史考察，往往借助特定载体展开讨论。这类论文中，尽管方志文献提供了相对丰富且系统的数据，但物质载体与思想演变之间的阐述却并非是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找出衔接思想的载体与思想演变的内在通路便显得格外重要。

笔者梳理方志自身的发展演变，2023 年历史学 CSSCI 期刊所见有关方志文化书写研究的专题论文有 3 篇（见表 3）。

表 3 2023 年历史学 CSSCI 来源期刊发表的方志学史研究论文统计表

序号	作者	论文名称	期刊
1	王旭	论宋元方志中的“乡里”类目	《史学史研究》2023 年第 2 期
2	徐帆	从政教传统到“助于笔端”——汉晋至唐宋地理总志的风俗书写演变	《史学理论》2023 年第 5 期
3	罗艳春	北人氏族的知识史研究：以《深州风土记·人谱》为例	《史林》2023 年第 6 期

上述 3 篇论文均是关于方志书写的研究，或是“乡里”，或为“风俗”，或聚焦“人物”，既是方志学史的深化，也是社会文化史视野下愈来愈关注方志文本本身的转向。这类研究不仅用社会文化史范式的解读方法，探讨方志中不同门目内容背后的政治语境、地方观念与族群意识，也重视挖掘方志文本内容自身的文献价值，强调重新发现“地区”并展现一定区域内特定现象或活动发生的基本场景，体现出方志应用于史学研究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在这种向下的视野中，愈来愈多学者从深入追问“方志知识生产的过程”逐渐回归到兼顾“方志知识本身”，纠正了以往史学研究中对方志文献过度阐述的弊端。

毋庸置疑，零散而丰富的方志内容是史学研究的史料基础，并成为相关史学问题建构与讨论的支柱。史学本身是一门以碎片性史料为基础的学问，史学家根据“断裂的零散的史料”窥探完整的历史叙事及背后系统的形态与意义。就此意义而言，方志资料的碎片化特性与方志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将不断加剧史学论文中应用方志的随机性。

三 史学研究中应用方志的种类与特点

方志愈加频繁地应用于史学研究中，将不断增进史学研究内容的丰富与范式的更新。在史学研究中应用方志时，方志自身的门目类别、编纂程式与编纂理念亦是影响其价值发挥的重要因素。门目类别限制着方志记述的层级与范围，编纂程式与理念则是反映方志文本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特征。

（一）方志应用的种类

本文考察的 294 篇历史学领域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其引文所见方志数量近 2700 条，以旧志为核心，约占 85.18%。笔者梳理其中 2200 余条标注有编纂时期的旧志，将编纂时间精确至年号，并将 1912—1948 年间编纂的方志统一计为“民国方志”，将其中引用旧方志最多的 15 个时期绘制成图（见图 1）。

① 参见李媛：《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中国史研究》2023 年第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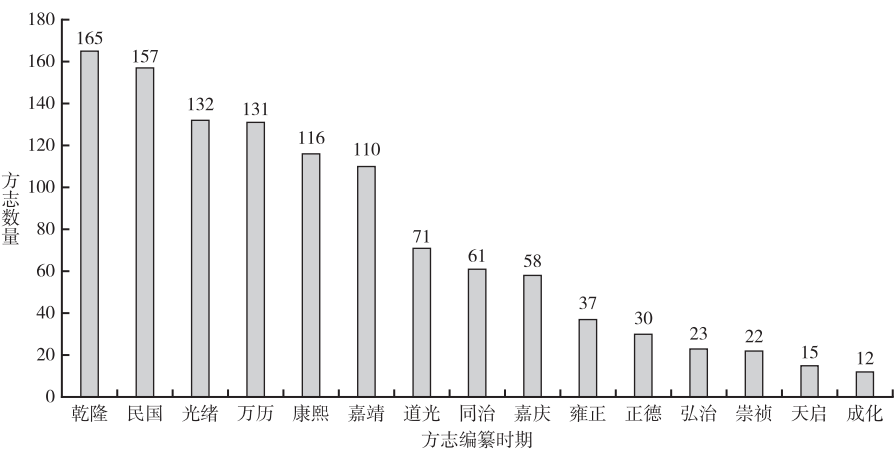


图 1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中引用各时期方志的数量统计图

方志编纂时间揭示了方志文本背后的社会语境与历史情境，是辨明方志编纂意图、考证方志文本意涵的重要特征。现存方志中，清代方志数量最多，因此史学研究中利用率最高的是清代方志，尤以清前期的康乾时代与晚清的光绪时期编纂的方志应用最多。明代万历、嘉靖时期编纂的方志应用也较为频繁。

引文所见旧志类型各异，既有国家层面编修的一统志，又有各级地方政府主持编纂的省、府、厅、州、县、镇等各级志书，亦包括各类专志。若以编纂机构隶属层级分类，引文所见且具体可考的国家或地方政府主持编纂的各级行政区级志书数量统计如表 4，其中高层政区、统县政区、基层政区编纂方志数量的比例约为 2∶6∶11。^① 旧志的镇志、村志、乡土志、卫所志等散见于各类史学论文中，常见基层志书如《朱家角镇志》《石码镇志》《紫堤村志》《石牌村志》《新疆乡土志稿》等。行政区级志书与基层志书的广泛使用，显示出方志文献在小范围区域社会史考察中的重要价值。

表 4 各级地方政府主持编纂的旧志数量统计表

政区类别	高层政区	统县政区			县级政区
具体政区	省志	府志	厅志	州志	县志
方志数量	115	246	11	97	646

专志应用颇为广泛。旧志常见专志如《浙省安徽会馆志》《两淮盐法志》《枣庄矿务局志》《粤秀书院志》等，关乎“盐法”“矿务”等地方治理与“会馆”“书院”等社会商业文化现象的考察，反映了专志用于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旨趣。专志亦是新方志中被引用最多的类别，诸如《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志》《安徽省红星机械厂厂志》《九三七三厂志（1986—2005）》《九三二四厂志（1986—2003 年）》等公司志、厂志普遍应用于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其他如《上海出版志》《上海外事志》《临淄文物志》《中国小麦品种志》《普陀渔业志》《舟山市军事

^① 此处高层政区、统县政区与基层政区的概念，参考了周振鹤中国政区“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但不将县级政区称为基层政区，而是将县级及县以下的乡、镇、村等统称为“基层”。参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41 页。

志》等门类各异的专志也出现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

方志门类类别不仅体现出方志的编纂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方志应用的范围。笔者汇集上述史学论文中应用的方志门类名称绘制词云图，如图 2。



图 2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引文中所见方志门类数据词云图^①

阅读词云图可见，“物产”“风俗”“食货志”“田赋”等关涉经济活动的词语高频出现，“序”“艺文”“人物”等的使用紧随其后，显示出艺文志、人物志等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至于“山川”“地理”“水利”“城池”等方志门类内容，则多用于地理沿革类论文的书写。

梳理中国史研究论文中应用的方志文献，不仅有利于选择史学研究所依赖的史料，亦为整理旧方志、编纂新方志提供学术导向。方志常见的门类，如赋税经济、物产风俗、人物、艺文等是史学研究中引用最多的数据来源，整理旧方志、编纂新方志时亦应对该部分数据给予更多关注，以更好地发挥方志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二）方志应用的特点

特定研究主题与方志自身的文献特点决定史学论文中应用的方志类型。一般而言，进入史学研究的方志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应用于史学研究中的方志，其门类主题较为集中，聚焦于物产、赋税、土地为代表的经济类，与艺文等常见类别，构成中国经济史、明清区域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资料基础。然而，方志部分门目的学术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如分野、冢墓、古迹、祥异等门类应用不多。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修志原则和用志者的研究目的相关。传统修志强调“述而不论”，导致内容记述重视“纪实”而忽略“分析”，停留在表面而未能深入。“但书其实，自见其实”的实证精神和秉笔直书的修志原则虽然保证了方志内容的面面俱到，但又导致分析的不足。譬如方志中的“灾祥”，往往只记述灾异发生的时间、地点，简述经过，几乎不涉及对灾异发生原因、善后治理的记载，导致方志的史料基础薄弱。此外，方志门类丰富，但部分门目的编纂和理解涉及更为精细的专业领域知识，如“分野”牵扯到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宇宙观等多个角度的内容，对学者自身的要求较高，因而在研究中涉猎不多。

① 笔者在制图时，有意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一般不更改门类名称，“艺文志”“艺文”，“人物”“人物传”“流寓”等同性质门类，仍然保留论文作者引用时的原本模样。

其二，史学研究中应用的方志，呈现出南方地区方志与若干经典名志利用度更高的特点。宋元以来，经济重心由北方逐渐转移至南方，南方经济活动愈加繁荣，南方方志的编纂与研究亦相对繁荣。江南地区，如徽州、漳州、松江地区的方志应用数量最高。此外，若干经典名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乾隆《江南通志》等出现在多篇文章参考文献中，显示名志在研究中的分量。一方面，学者们在应用方志时，往往是依据研究主题按图索骥检索方志，需要在众多方志中披沙沥金，经典名志自然占据高频应用的地位。另一方面，因方志资料看似全面而实则浅薄，单部方志往往难以支撑起专题性研究的史料基础，内容丰富的、独特的方志更易展开阐述与分析，如《桑园围志》《连阳八排风土记》特征鲜明的方志能够实现以点带面的研究效果。

其三，随着史学研究主题更加聚焦，尽管方志利用率更高，但方志应用却更为碎片化。2011年，李晓方指出以“基于某某地方志的考察”“以某某地方志为考察中心”“从地方志看某某问题”为副标题的论文数量庞杂^①，但在笔者的考察中，这类副标题却呈现出逐渐缩小的趋势。作为资料的方志既是“零散”的，又是“全面”的。从宏观来看，方志编纂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是全面的；但受到编纂时代背景、所处地域特征与编纂者主观意图的影响，异时、异地的方志记载的内容往往衔接性较差，又是零散的。因此随着各类方志数据库的建立，方志检索愈加便利，方志整体的应用数量虽呈现上升趋势，但方志在研究中往往不再作为单一史料，而是更加强调方志与其他多元史料的融合。

（三）方志应用在史学研究中的拓展

方志文献的内在特征，是其在史学论文中发挥价值的关键。不过史学论文决定选用何种方志作为核心论证史料，仍离不开研究自身的主题导向。上文关于史学研究中方志文献的考察，虽是按照经济史、政治军事史与社会文化史等单独研究领域分类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每篇论文在归类上只能非此即彼，而是彼此之间相互交织与渗透。经济史研究中的赋役史、漕运史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关照，政治史领域借助信仰载体展开的边疆认同考察、社会文化史中地区风俗信仰的考证，本质上都属于借助物质载体展开抽象意义和内涵的诠释。这些论文中已经展现出来的研究思路，与跨学科的区域社会史、概念史等视野下的研究方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强调方志文献性与史学研究性的互动中，促进史学不同研究领域的融合。

区域社会史是方志进入史学研究应用的基本层面。就范畴而言，区域社会史关注的是“区域的整体社会史”；就方法论而言，区域社会史考察“以区域社会为研究空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②。这两类研究都竭力避免宏大叙事，试图建构起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不同视角下的整体性的区域历史图景，以串联起制度的本地化效应与地域社会发展两类考察。方志是立足于一定行政区划编纂而成，而区域史研究考虑的不只有行政区划，更有山川形便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不假思索地囿于方志文献本身，建构起的只能是国家（王朝）—地方的二元对立视角，仅仅是“通志的地方化”而非“研究的区域化”^③。因此，方志中保存了大量地方性的资料，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最根本的底层根基，但过于简单的直接“拿来”的引用模式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社会史的整体考察。这类研究拓展的关键在于利用多地域、多层次、多视角的

① 参见李晓方：《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7期。

② 参见唐仕春：《心系整体史——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及其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③ 参见王先明：《“区域化”取向与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方志建立起更为宏观的呼应。

概念史研究显示方志文献应用于政治史、文化史考察时的多元观照。概念史研究中引用方志，不仅追问方志书写时“词语”“文本”的选择，而且能将词语扩展到方志记述的物质载体，前者强调对方志语境的关注，后者侧重于载体演变背后区域社会的政治认同与文化信仰。譬如方志中关于“地方动乱”的研究，黄志繁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动乱”有两层内涵：一是“动乱”“盗贼”是文献记载者基于主观感觉的建构，作为文献记载者的官府或地方精英在方志等官修书籍中人为地定义了“动乱”；二是“动乱”的本质是王朝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矛盾，王朝（国家/地方）理解的失序社会未必不是地方的“常态”秩序，“动乱”并不一定是真的动乱。^①因“贼”“盗”“寇”的社会组织处于官府对立面，长期在方志的记载中处于失语状态，如广西红瑶、连阳八排瑶、红袄军武装团体的考察等，显示出高位政治语境与高位文化语境影响下方志对处于官府对立面的民众的歪曲记载。

目前概念史研究中较新的一个考察视角是计量方法的引入，这一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史学研究中方志的应用情况。李娜抽取《方志物产》山西分卷中51545条物产信息，构建起物产—人物关系网络，借此梳理不同阶层人群对物产的多样需要。^②该文显示出大数据应用于方志文本研究的空间。方志较为严格规整的体例与丰富的内容，为方志进入量化史学的研究奠定基础。遗憾的是，因OCR形式的数字方志资源并不丰富，数字方志的研究尚未同数字史学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掀起热潮。

结 语

相较于为方志编纂寻求理论依据的传统研究模式，近年来方志应用研究愈来愈侧重方志的文献价值，强调方志史料价值的学术钩沉。整体而言，方志文献进入不同领域史学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应用范围与局限，既有共性又有独特性。方志引用的独特性与所属研究领域紧密相关，方志引用的共性则在于无论何种方志，在应用时都离不开对文本背景的解读，兼与其他史料的多源互证。经济史研究中使用方志，需要注意对方志中记载的各类数据进行解读与比较分析，以辨明或修正过往认知，若忽视当时的政治制度，盲目相信方志数字，则难免导致误读。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中引用方志，不仅需要分辨政治、历史、文化的三重语境对文本书写与诠释的干扰，而且需要建构起物质载体与政治文化意涵间的联系。史学碎片化影响下的今天，愈来愈多学者注意到利用方志进行考证工作或反过来回溯方志的书写脉络。梳理方志文献在中国史各专题研究的应用特点，不仅能帮助发现史学研究新范式，亦能反哺于方志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参见黄志繁：《“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2—13页。

② 参见李娜：《〈方志物产〉中物产与人物的社会网络构建与分析》，《中国农史》2023年第2期。